

古人应对疫情的那些事儿

壹

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

在传统史籍中，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，所用的名称有疫、疾疫、疔等，而一般统称为疫，合称疾疫。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，这些疾疫包括瘟疫、瘴气、痢疾、流行性感冒、麻风病等，包含甚广。

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。鲁庄公二十年夏，“齐大灾”。按照《公羊传》的解释，此大灾即大疫。

此后，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。据邓拓在《中国救荒史》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，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：周代1次，秦汉13次，魏晋17次，隋唐17次，两宋32次，元代20次，明代64次，清代74次。从死亡人数看，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（1232年），汴京大疫，“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，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”。可见，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。

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，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。一般而言，大灾之后，人畜大量死亡，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，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，从而导致疫灾发生。如隋代大业八年（612年），天下大旱，继而发生大疫，染疫者多死。宋朝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河北发生大水灾。次年三月，又继发疫灾。元代至顺二年（1331年），衡州连年大旱，接着发生疫病之灾，“死者十九”。

贰

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

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的认识，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。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。

先秦时期，传说帝颡项有三子，生而亡去为鬼，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。为此，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，作法以驱除疫鬼。《周礼·夏官》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。此四人身披熊皮，头戴面具，执戈扬盾，帅百隶逐室殴疫，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。除此以外，历代流行的设醮、纸船送瘟神等民俗，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，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。

医学的发展，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疫灾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，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。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，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阔岁久，“淤泥恶水，停蓄弗流，春秋之交，蒸为疔疫”，乃作《开沟告诸庙祝文》，兴工清理沟渠。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（1166年）知隆兴府，当地“旧有豫章沟，比久湮塞，民病途潦。公曰：‘沟洫不通，气郁不泄，疫疔所由生也。’亟命疏浚，民得爽垲以居。”



1910年抗击鼠疫时，在哈尔滨傅家甸内成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。



资料图片

叁

“隔离”曾被讥为“不仁”

一旦出现疫情，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？许多典籍表明，是隔离。这种方法自古有之，而且，除此之外，再无更好的方法。

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《汉书·平帝纪》：“元始二年，旱蝗，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。”到了南北朝时期，隔离之法，已成为制度。萧齐时，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——六疾馆，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。

然而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

并非一帆风顺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。晋时就有记载说如朝臣家染上时疫，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，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，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。但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，却被当时人讥讽为“不仁”。

这种观念根深蒂固，乃至疫情出现以后，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。所以，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。

肆

不少药方值得后人总结和继承

一旦出现疫死者，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，该作何处理呢？据《周礼》所载，从先秦时期开始，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。此后，凡遇大疫，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。如南朝梁武帝时，郢城大疫，全城十余万口，“死者十七八”。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，以防止疾疫传染。在宋代，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，以度牒为奖励。如嘉定元年（1208年），江淮一带大疫，官府遂招募志愿者，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。此外，从北宋末年开，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，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。宋代以后，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，普遍建立漏泽园，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。

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，除了专

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，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、偏方尚有不少，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。如苏轼在《与王敏仲书》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：“用姜、葱、豉三物，浓煮热呷，无不效者。”《宋史·外国·吐蕃》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，六谷吐蕃的唃廝囉部族发生疾疫，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、犀角、硫黄、安息香、白石英等76种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的一则事例说，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，颇有神奇之效。《靖康纪闻》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，其方为：“黑豆二钱（令炒香熟）、甘草二寸（炒黄色），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，时时服之自愈。”元人笔记《辍耕录》中记载：元朝初年时，元军发生疾疫，以大黄疗治，所活近万人，效果亦极显著。

伍

遇疫情咋拨款

疫病是公共事件，古代政府也会提供专项资金，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治疫情。比如宋真宗景德三年，朝廷就拨付各州五十贯钱用于购买防疫药物；宋仁宗时又把各州防疫的药钱增加到二百贯，以后这也成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。针对军队中人数众多等容易发生瘟疫的地方，宋朝政府还派专使和医博士在群众中宣传防疫知识，并要求按时服用防疫药物。京师和地方药局，都要配置防疾疫的药物，以方便人们购买服用。

对已经患上疾疫的病人，政

府也采取多种渠道加以救治。还以宋朝为例，宋太宗时，京城发生瘟疫，太宗就命选派良医十人去诊视病人；高宗时，临安发生瘟疫，高宗拿出柴胡制药，“救活者甚众”；孝宗淳熙十四年，临安又一次发生瘟疫，和剂局就制成防疫汤药，免费发放，救治百姓。在资金的运用上，除了政府拨款外，宋政府还提倡商人捐资救助和动员民间力量，劝谕富有人家施医舍药，多头齐下，消灭疾疫。

据《天津日报》《揭阳日报》

延伸阅读

肺鼠疫与伍氏口罩

口罩，成了这个冬天最紧俏的商品。中国人用上两层纱布中间包着吸水棉的加厚口罩，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中央医院的创始人伍连德博士密不可分。

1910年10月，中国东北暴发严重流行性鼠疫，先后共有约6万人死亡。1910年12月，伍连德受命前往东北调查疫情。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，伍连德听说有一位感染者濒临死亡，便急忙赶去患者家中。这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，感染鼠疫，不治身亡。伍连德秘密解剖了尸体，从血管、心脏、肺叶等处提取标本做细菌培养，这是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。



伍氏加厚口罩有效抑制了疫情传播。

伍连德和他的助手很快发现，这场鼠疫不是常见的经由鼠与人之间传播，而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，加上有发烧、咳嗽、肺部感染等症状，他首次提出“肺鼠疫”的概念，区别于已知的“腺鼠疫”。而人与人之间的飞沫传播，是“肺鼠疫”造成危害最主要的传播方式。

对于人与人接触导致的飞沫传染，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防护知识和措施，伍连德用纱布设计了一种缝制简单的加厚口罩，两层纱布中间包消毒棉，要求所有防疫人员和居民必须佩戴，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为“伍氏口罩”。

当时正值年关，为阻止疫情随返乡过年的人流沿铁路传播，伍连德提出了初步的防疫措施：控制铁路、公路交通，以防瘟疫蔓延；隔离疫区；向关内征聘医生。他还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，培训、调动包括邮递员在内的各行业服务人员一起投入防疫活动。他在回忆录《鼠疫斗士：伍连德自述》中写道：“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，给医生、警察、军队，甚至地方官吏下令。”

为了切断疫源，伍连德提出火葬，这在当时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，是不可能被接受的。经过层层上报，最终由摄政王载沣拍板，同意伍连德的意见。采取一系列措施之后，1911年3月初，哈尔滨肺鼠疫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。



伍连德(左)和同事在开展瘟疫实验。

疫情扑灭后，满清政府拨款10万两平库银，邀请与中国有联系的各国，前来奉天（今沈阳）召开国际学术会议，研讨总结东北鼠疫防控。1911年4月3日，“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”召开，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会议主席、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。参会者中有33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，包括独立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。

作为抗击此次鼠疫的总指挥，伍连德至此以“鼠疫斗士”之名享誉世界。此后，伍连德联合俄国考察团，在野外寻找鼠疫疫源，发现广布于草原的旱獭，是东北肺鼠疫流行的根源所在。据《北京日报》